

他去了，给人们留下一连串的故事和疑问，这些二度激动过多少不同年龄与不同性别的人们，然而现在已经被人们逐渐忘却。我们往往易于淡忘痛苦的，中性的回忆，我们都是阿Q，否则难以生存。

丁东◎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

五瓦雨

逝者

文立微 郭世英 林昭 罗克 元准 姚锦云 赵一凡 王瑶 冯契 南岩 余易木 郑惠 杨小凯 李子云 刘向宏 李如波 张鲁 史铁生

思念者

李锐 周国平 刘发清 王学泰 罗基方 徐睿晓 徐俪生 毕星星 张守仁 龚育之 邓晓芒 马懋如 吴迪夫 蜀何章立凡

十九桩刻骨铭心的人生往事

風雨歸窗

丁东◎主编

◎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雨同窗：十九桩刻骨铭心的人生往事/丁东主编.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1. 6

（背影书系）

ISBN 978 - 7 - 5008 - 4972 - 8

I. ①风… II. ①丁… III. ①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①k82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5200 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100120

发行热线：(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250 千字

印 张：20.75

定 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 丁 东

《此生此情》编定以后，中国工人出版社的陈大钢先生又约我启动了这本书的编选。

本书的主题是追忆逝去的同学。同窗是同学的雅称。在各种人际关系中，同学具有特殊的意义，不是亲属，却可以比亲属更融洽。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夫妻之间的关系可以亲密无间，也可以反目成仇，却又不能不面对。而同学关系相对单纯，年龄相近，人格平等，合得来则交往，合不来则疏远，可深可浅，可聚可散，没有共处一处互相折磨的必要。所以常有这样的现象，有人在家庭中得不到亲情，却可以在同学中获得友情。同学去世，能写出感人至深的悼文者，必是同气相求，心灵相通。

篇幅所限，本书仅选了十九篇文章。但我还是想在有限的空间中，尽可能扩展时间的跨度。书中李锐和文立微、赵俪生和王瑶、冯契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同学，龚育之和郑惠是四十年代的同学，刘发清和林昭、罗基和沈元、王学泰和

遇罗克、毕星星和南岩是五十年代的同学，章立凡和史铁生、沈睿和姚锦云是六十年代同学、野夫和李如波是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同学。把这些本不相干的文章编排在一起，无意中展开了一部当代同窗的历史长卷。同学少年，处于不同的时代，受到理想的感召，从投身救亡，反对独裁，到追求自由，告别蒙昧，可称风雨苍黄，气象万千。超越政治史的角度，从社会史、教育史、学术史、文化史的角度，亦可横看成岭，侧看成峰，品出酸甜苦辣的不同意味。

与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相比，思想家在当代中国是最稀缺的一种人。本书着意选择了对顾准、林昭、遇罗克、杨小凯几位思想家的追忆。这些悼文不可能全面总结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只从同窗的角度，展示一段近距离的独特交往。其中徐方和她的母亲张纯音与顾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同学，而是在文革期间一起进了五七干校，算是一种特殊的同窗关系吧。

浏览追忆同窗的悼文，我发现以大学、中学同窗居多，小学同窗又能写出丰厚人文内涵的文章则十分稀缺。因而，沈睿回忆小学同窗姚锦云的《残酷的青春》就显得别具一格。她们在文革中共同经历了青春期。而那个年代少女特有的精神历程，史家缺少记载。所以此文虽然篇幅颇长，仍然不愿割爱。

同窗以外，还有若干追忆同代好友的悼文，意趣与同窗相近，一并选入本书。

二〇一一年五月

目 录

1 序 ◎丁 东

文立徵 军人，湖南衡山人，1911年出生，1945年2月22日逝世于山东临城

1 想念你啊， 文立徵 ◎李 锐

郭世英 学生，1942年出生，1968年逝世于北京

6 影响了我一生的人 ◎周国平

林昭 思想家，1932年12月16日生于苏州，1968年4月29日逝世于上海

55 一个不屈的英魂 ◎刘发清

遇罗克 思想家，1942年生于北京，1970年3月5日逝世于北京

63 一本书的故事 ◎王学泰

沈元 历史学家，1970年4月逝世于北京

67 哀沈元 ◎罗 基

顾准 思想家，1915年7月1日生于上海，1974年12月3日逝世于北京

109 两代人的良师益友 ◎徐 方

姚锦云 工人，1982年2月17日逝世于北京

125 残酷的青春 ◎沈 睿

赵一凡 民间知识分子，1935 年生于上海，1988 年逝世于北京

202 无题往事 ◎ 徐 晓

王瑶 文学史家，1914 年 5 月 7 日生于山西平遥，1989 年 12 月 13 日逝世于上海

冯契 哲学家，1915 年出生于浙江诸暨，1995 年逝世

214 记王瑶与冯契 ◎ 赵赓生

南岩 中学教师，1949 年 3 月 9 日生于山西运城，1997 年 3 月 22 日逝世于山西运城

219 南岩之死 ◎ 毕星星

余易木 作家，1937 年生于上海，1998 年 8 月 18 日逝世于青海西宁

239 文坛英才余易木 ◎ 张守仁

郑惠 历史学家，2003 年 2 月 17 日逝世于北京

253 故人长忆亦长磋 · ◎ 龚育之

杨小凯 思想家，经济学家，1948 年 10 月 6 日生于吉林敦化，2004 年 7 月 7 日逝世于澳大利亚墨尔本

261 我与杨小凯 ◎ 邓晓芒

李子云 文学评论家，1930 年出生于北京，2009 年 6 月 10 日逝世于上海

273 四条小辫子 ◎ 马懋如

刘向宏 编辑家，2010 年 1 月 30 日逝世于北京

284 纵无健笔书青史，不敢心声付蛀尘 ◎ 吴 迪

李如波 中学教师，1948 年出生，1994 年逝世

290 别梦依稀咒逝川 ◎ 野 夫

张鲁 剧作家，1952 年 6 月出生，2010 年 11 月逝世

309 悼张鲁 ◎ 何 蜀

史铁生 作家，1951 年 1 月 4 日生于北京，2010 年 12 月 31 日逝世于北京

321 铁生：自由飞翔的灵魂 ◎ 章立凡

文立徵 军人，湖南衡山人，1911年出生，1945年
2月22日逝世于山东临城

想念你啊，文立徵

◎ 李 锐 水电专家，现居北京

寇逼徐州入鲁先，
得知消息换人间。
忠魂定不回衡岳，
日出当观泰岳颠。

——《龙胆紫集·哭文立徵》

70年代初，在京郊秦城狱中怀念老友立徵时，作了上面这首绝句。我们是平津失陷后一起到济南并留在山东的。1938年3月，我到武汉开会，碰到立徵从鲁北前线辗转回后方找组织关系。于是我介绍他入了党，一起来到徐州；他和同行的十几个青年同志，立刻被苏鲁豫特委派到鲁南开辟工作。我们就此分手，一直不通通讯。1949年南下途中，遇到山东的老同志，才知立徵于1945年初在鲁南游击区牺牲了。

去年1月我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后，立徵的一位表弟不断来信，为的是立徵老家湖南衡山县，由于“找不到

入党证明人”，多年来不承认立微的烈士身份，甚至还有说他是伪军的。表弟寄来一厚本复印的二十二个人写的证明材料，他们都是立微的战友和同事，有省军区政委、军分区司令员、特级战斗英雄、游击区区长、影片《大浪淘沙》作者，等等。这时我才发现，我的这位老同学、好朋友文立微，原来还担任过赫赫有名的铁道游击队的政委。

现在的年轻人呵，你可曾知道，你们从电影和小说上认识的那位铁道游击队政委，牺牲时还不过三十四岁；他家中富有，是国民党一个高级军官的儿子；他在北平辅仁大学学化学，英文很好，又爱好文艺，会吹口琴，还喜欢照相，写得一手好字；抗战期间，他在鲁南艰苦的环境中打了八年游击战；他只有短暂的初恋，没有结婚。

为了敦促我写一篇纪念立微的文章，他的表弟又寄来珍藏的立微于1934、1935年两年写给弟弟的十五封信，其中有1935年12月11日、18日两信，详细描述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参加游行示威的悲壮情景。“一二·九”的当夜，立微就给我写了信，告知游行队伍怎样在王府井南口同警察的水龙、皮带奋战。我收到这封信后，即用报纸抄好，张贴在文学院大门口，燃起了武汉大学同学们的愤怒之火。

在中学时，立微是一个非常用功、沉默寡言的人；午饭后必临魏碑，当做午休。我们直到高三才成为好朋友。这是由于两人都爱读邹韬奋编的《生活》，都好写白话文，一起办班上的墙报，常常旷课同去看联华公司的进步电影，我们的政治思想倾向完全相同。1934年上大学后，我们每周通信，从不间断；谈论的范围很广，“一二·九”前后，华北形势、国家命运成为主要话题。当年的辅仁是有党组织的，大概由于立微沉静内向的性格，以及学校生活环境，没有可能同组织中人接触。1937年5月，我离开学校来到北平接党的关系。6月间，他就正式办了退学手续，跟我住在一起。遗憾的是，当时没来得及介绍他入党；但他从我处看到许多党的刊物，他也自认为像我一样，是一个共产党员了。1937年8月到达济南后，我们就决定不回后方，留在山东打游击，

接受组织的安排，进了韩复榘第三路军的抗日军政工作人员训练班。大概从这时起，他的性格和作风，有了某种根本的变化。

从1938年3月后，我和立徵虽然没有再生活、战斗在一起，但这一厚本证明材料告诉我：这个沉默寡言、曾经热心于化学试验的人，由于斗争的需要，从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普通一员，成长为一名深受鲁南当地人民爱戴的游击战士和指挥员。鲁南人民义勇总队和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都是1938年春夏间建立的党领导的群众武装。立徵参加这个部队后，就改名文立正。据当时在这个部队任政训处长的朱道南同志说：“我只兼名义，实际工作由文立正做。1938年3、4月间，我们带义勇队一个大队到台儿庄一带活动，随即回到峰县四区，和国民党几个比较进步的司令共同协议成立了抗日军联合委员会，办了一个青年训练班，由文立正负责主持。1938年7月，同党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特种工作团第五大队的邵剑秋，抗日坚决，政治进步，一再要求立正到该部工作。特委即派立正以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到第五大队，在那里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组织。立正的威信甚高，为所有的干部和士兵所爱戴。”1938年秋，朱道南到国民党第三专署保安第五旅工作，这是一支带土匪成分的队伍，工作很困难。朱道南就向山东分局统战部要求，立徵又被调来当政治部主任。这支部队整顿好了后，1939年秋，立徵又被调回第五大队。朱道南说：“当年冬，邵剑秋部正式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这可说是文立正同志初期工作的一大成果。”

立徵在第五大队和运河支队工作两年多，邵剑秋至今非常怀念他。他写的材料说：第五大队成员都是自愿集合起来抗日的老百姓，只有朴素的民族意识，对抗战的持久性、艰巨性认识不清，更不懂得革命的道理。立徵在部队教政治课，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用油印印成带画的书，极受战士欢迎，终于使这支部队成为有纪律、有觉悟的抗日部队。在运河支队成立前，干部和战士都叫他文老师。这支部队在立徵的教育指导下，在军事上也懂得了游击战术，除了一般战斗外，打过好几次比较有名的胜仗。如在津浦路上唐湖车站附近

袭击日寇军用火车，在津浦路侧伏击汽车，曹家埠歼灭战，夜袭利国铁矿，奇袭唐湖车站据点，等等。这都同立微的正确指挥有直接关系。在抗战年代里，部队物资供应极端困难，吃饭、穿衣全靠当地群众。在日寇扫荡、围剿、封锁和日、伪、顽合流向我们进攻的情况下，常常吃不饱、穿不暖。立微爱吃高粱煎饼卷辣椒，常穿一件破棉袍。

1941年3月，立微被鲁南军区派到第三军分区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这个地区即现在的临沂、郯城、邳县、枣庄平原地区，是当年非常艰苦的游击区。1943年到峰、滕、沛地区检查独立支队工作时，因政治委员牺牲了，即留立微任独立支队政委，并兼任过八个月铁道游击队政委。后来由于小说和电影的关系，铁道游击队真是十分出名了，当年配合铁道游击队工作，在临城六区当区长的范有功，追忆起政委文立微的时候，叙述了当年他在游击队的一些生动场面：为了应付敌人，他穿着褴褛的衣服，戴一顶破毡帽头，穿一双铲鞋（一种很结实的布鞋）。真像小说上写的李正，穿一件破烂棉袍，束一根用布梳子编成的腰带。他个儿矮，袍子太长，就把前大襟翻起，掖在腰带里。破裤子也补满了白、黑、蓝各色补丁。他常带两支短枪，掖在胸前袍子里。战士们在铁路上斗争，都穿一色服装，很“阔气”，都有手表好枪，文立微等领导同志跟随队伍在周围村子里隐蔽指挥。当时护送干部过路，他总亲自参加。记得有一次大清早，见他毡帽上沾有稻草，准是夜里在哪个草堆里“歪块”（随便躺）了半夜。当时生活很苦，几个小枣也算一天口粮。有一天，他拿着一小块果子饼认真地对范有功说：“伙计，咱们今天有饭了。”他非常爱学习，军装上衣和大襟衣的口袋里，全是用布面订的小记录本，写满了密密麻麻的铅笔字。他很沉着，遇事总要弄个清楚，不轻易下决断。他非常乐观，对人总是和蔼可亲，从不高声说话。他是领导干部，在群众中却很活跃，会吹口琴，总随身带着，一边吹，一边还教小孩们跳舞。

1945年2月，立微到当时的临城县六区（今滕县西岗公社）检查扩军情况，这一带群众都亲热地叫他文科长。这里是游击区，他住在丁家

堂村。区武装队的一个副班长是内奸，勾结伪专员大汉奸申宪五的匪军，于2月22日深夜突然袭击，立徵不幸遇难。滕县以西、微山县以北广大群众，知道文科长在丁家堂牺牲了，称这次事件为丁家堂惨案。1945年和1948年，这个内奸和申宪五先后被我军捕获，在当地开了公审大会后枪决。

立徵牺牲之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十分悲痛，从当地一个大地主家找来一口柏木棺材，将他的背包、衣物一起入殓，埋葬在丁家堂村；在追悼会上唱了临时编的挽歌。解放以后，西岗公社丁家堂村等地群众每年清明和国庆节，总有几千人到文科长墓前开纪念大会，献上花圈，安上高音喇叭，宣传他的英雄事迹。

相信立徵家乡湖南省衡山县的人民，也一定会以故乡出了这样一个人民的好儿子而引为光荣。忠魂呵，你现在可以回衡岳省亲，看望看望家园了。

写于1980年11月

郭世英

学生，1942 年出生，1968 年逝世于北京

影响了我一生的人

◎ 周国平 学者，现居北京

进北大的第一天，就有消息灵通的同学对我说，郭沫若的儿子在我们班。北大是高干子女云集的学校，这没有什么。见到郭世英是在两天后，各班分组讨论系副主任的入学教育报告。那个报告乏味透顶，郭世英并没有听，他来校时正好碰上讨论。人们挤挨着坐在寝室里，一个接一个发言。郭世英也发言了。他坐在双层床的下铺，微低着头，长发下垂，眼睛凝视着地面某处。他的声音深沉而悦耳，话音很低，有时几乎听不清，仿佛不是在发言，而是在一边思考一边自语。他说的大意是，从高三开始，他对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许多书。哲学的宗旨是追求真理。一种理论是不是真理，必须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检验，对马克思主义也应如此。结果，从追求真理出发，他走向了怀疑马克思主义。为此他陷入了苦恼之中，离校休学了。在休学期间，他想明白了问题之所在。马克思主义是有阶级性的，离开了阶级观点，单凭抽象思维，就无法理解马克

思主义。

在发言时，他的脸上始终凝集着深思的神情，他的语调诚恳而富于感染力。发言结束后，寝室里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我心中有一种深深的感动。打动我的与其说是他发言的内容，不如说是由声音、神情、说话方式造成的整个氛围。当时我并不真正理解他的话，我相信别人更是如此，在座的还没有人想到要自己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因而对他的问题和苦恼都是隔膜的。然而，正因为如此，我格外鲜明地感觉到，眼前的这个人属于一种我未尝见过的人的类型，其特征是对于思想的认真和诚实，既不愿盲从，也不愿自欺欺人。这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精神性的人。

后来通过交谈，我知道了世英的大致经历。他中学上的是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女学校一零一中学，在学校里，他一直是三好学生、模范共青团员，被誉为高干子弟的表率。同级不同班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另一个是将门之子孙经武，因为思想反动受批判，而世英扮演的是批判会上主将的角色。但是，到快毕业时，他开始反省自己，进而否定了自己的过去，从此与这两人有了密切来往。离开一零一中后，他进外交学院上学，因为思想问题而不能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继续读下去，休学一段时间，然后转学到了北大。

进入北大后，世英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精神平静时期。他在入学讨论会上的发言表明，他试图调整自己的方向，尽量与主流思想靠拢。可是，这一努力并不成功。时过不久，他的业已觉醒的思想者本能不再能忍受当时的政治和教育环境，冲突在所难免，内心十分痛苦。从第二学期初开始，张鹤慈和孙经武经常在我们寝室的门口出现了。1963年5月，东窗事发，他们三人被捕。世英没有上完一年级，就离开了北大。

刚开学时，世英总和一个名叫李建智的同学在一起，李也是一零一中毕业的，喜欢画画，他们俩经常携着画夹到校园里互画人像素描。不多天，李因查出肺结核休学，我顶替了他的空缺。世英是一个离不开朋友的人，他显然喜欢我，而我又深深地被他吸引。只要他在学校里，我

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住同一寝室，早晨一同洗漱，一同上食堂。去教室上课，往返路上，他骑自行车，我就坐在后座上。我们还常常一同逃课，躲在寝室里看书或闲聊。晚上熄灯后，我们会在盥洗室里逗留一会儿，他压低嗓音向我发表各种感想。他对我基本上无话不谈，后来成立X以后，他以及张、孙写的作品，他也都拿给我看。因此，对于导致他后来惨死的那个X小团体的情况，我可以算是一个相当知情的人。

在语文课的一篇作文里，世英写道：“我什么话都对周国平说，不知道这是因为他小，还是因为他能理解人。”语文老师“因为他小”旁边打了一个问号，批道：“小怎么是理由呢？”他有所不知，其实小还真是一个原因。我是全年级年龄最小的，而且样子比年龄又小许多，进大学后仍在长个儿，临毕业还常被人误当做中学生。有一回，我进一家旧书店挑了几本书，付款时，收款的老头好奇地问我哪个中学的，突然瞥见我的校徽，立刻叫起来：“快看，这么小就上北大了，还买这么多书！”正在架前挑书的几个女中学生都回头看我，使我既害羞又得意。世英对我的喜欢的确有怜小的因素，跟张、孙谈到我时总把我呢称作小家伙。其实，所谓“能理解人”也和小有关系，因为小，不通世故，心地单纯，又敏于感受，因此在全班同学为求政治上的进步而与世英拉开距离时，我独能对他怀着同情的理解。不过，真正说来，我是崇拜世英的，这是一个少年对一个富有魅力的青年的情不自禁的崇拜。他比我大三岁，现在想来，当时也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孩子而已，但在那时的我眼里就算一个大人了。他的外表就非常帅，身高一米七八的个儿，体格匀称结实，一张轮廓分明极具个性的脸，很像一张照片中的青年马雅可夫斯基，经常穿一件中式对襟布褂，风度既朴素又与众不同。当然，更令我折服的是他的精神素质，除了思想上的真诚之外，他又是一个极善良的人，对朋友一片赤忱，热情奔放，并且富有幽默感，顽皮而善于说俏皮话。我是在最容易崇拜一个人的时候遇见他的，然而，即使在已经度过了大半生的今天，我仍然敢说，他是我今生今世遇见的最具人性魅力的人。

我在北大一共生活了六年，其中，上学仅两年，农村四清两年，文革又两年。在这六年中，我与世英有两段密切的交往，一是大学一年级，另一是文革中直到他去世。当我回顾我的北大岁月时，与世英的交往无疑是其中最难忘也最重要的篇章。我完全有理由说，我从这一交往中学到的东西，远比哲学系全部课程所教给我的更多，当然也更本质。如果没有世英，我相信我仍能凭借自己的悟性走上后来走的路，但是，因为青春期播下的种子比较单薄，这条路上的风景会逊色得多。对于我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郭世英就意味着我的大学时代，而文革就意味着郭世英之死。因此，我在这一部分中不免要经常谈到郭世英，不过将限于主要谈他对我的影响。我不想在这里讲述他的全部故事，那应该是另一本书的题材。

世界文学的宝库

刚开学不久，世英的床铺上放着一本《牛虻》，我拣来翻看，立刻被吸引住了，半天就读完了它。

“半天就读完了？”他赞赏地说，“嘿，像你这种年纪，拿起一本书，就会忘掉一切！”

我告诉他，这并非事实，我看书时常常会走神，他摇头表示不信。这是我们交往的开始。从此以后，他从家里带来一批又一批书，堆在床头的桌子上，他看，我也看。

新生入学要进行体格检查，我遇到了一点麻烦。校医院的院长，一个戴眼镜的瘦老头，在我的腹部按摸了一阵以后，在体检表上写下“肝脾各大一指”的诊断。他拉来两个女医生，让她们也摸，她们表示摸不出来。瘦老头坚持己见，向我宣布：肝脾都大，不是有血吸虫病，就是有肝炎，而排除不了这两种病就得休学。他把我转到北医三院复查，那里没查出什么名堂，他又把我转到人民医院，仿佛不查出两种病中的一种就决不罢休。人民医院在阜成门内，检查程序又相当繁复，我便一次

次步行在海淀与阜成门之间十公里左右的路途上。每次从医院出来，我都去阜内的一家旧书店，把步行省下的钱换成书，作为对自己的犒赏。世英向我建议，真休学也不错，在北京住下自学，他向我提供书籍。最后，人民医院没有查出两种病中的任何一种，瘦老头勉强在我的体检表上签署了同意入学的意见。于是，在开学半个学期后，我领到了学生证，取得了正式入学的资格。

那半个学期的折腾对于我完全不是坏事，由于没有正式入学的资格，我便有了合法不上课的权利，因而能够把大量时间用于阅读课外书。这个势头一经形成，就仿佛有了惯性，在取得入学资格之后也延续下去了。事实上，在大学第一学年，我的主要精力都用来读小说了。我从未这样痴迷地沉浸在小说中，而且恰恰是过去觉得读不懂而不去碰的外国小说。也许智性的成熟也有其季节，读《牛虻》的快乐是一个信号，表明时候到了。世英见我喜欢读书，便给我拿来了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我猜这也许是他特意安排的，他少年时迷恋俄罗斯文学，考虑到我的程度，就让我由此入门。

我立刻入迷了，每天手不释卷，读到很晚，经常超过了规定的熄灯时间。这引起了同寝室其他同学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一场纠纷。那天夜晚，我在灯下读《安娜·卡列尼娜》，已近尾声，不忍放下，比平时更晚了一些。一个安徽人开始谴责我，在床上不停翻身和唠叨。见我不理，他从床上跳起来，冲到门口，拉灭了电灯。等他上床，我又去把灯拉亮。他愤怒了，再跳下床拉灯，抓住灯绳不放，破口骂了起来。我感到委屈，一边还嘴，一边眼中沁出了泪花。世英拿起一本书，拉着我说：“走，到走廊里看。”从此以后，寝室里多数同学决议，晚上十点准时熄灯。我那时候也真不懂事，我是本不该妨碍别人休息的。不过，我想不通的是，他们也都年纪轻轻，为何这么早上床，不珍惜夜晚最佳的读书时间。时常当我读书读得入迷的时候，突然灯灭了，我坐在黑暗中，凝望着窗外月光下朦胧的景物，两眼泪光闪闪。我痛恨那只拉开关的手，它多么残酷，夺走了我的欢乐，我的时间，从我的生命线上又割